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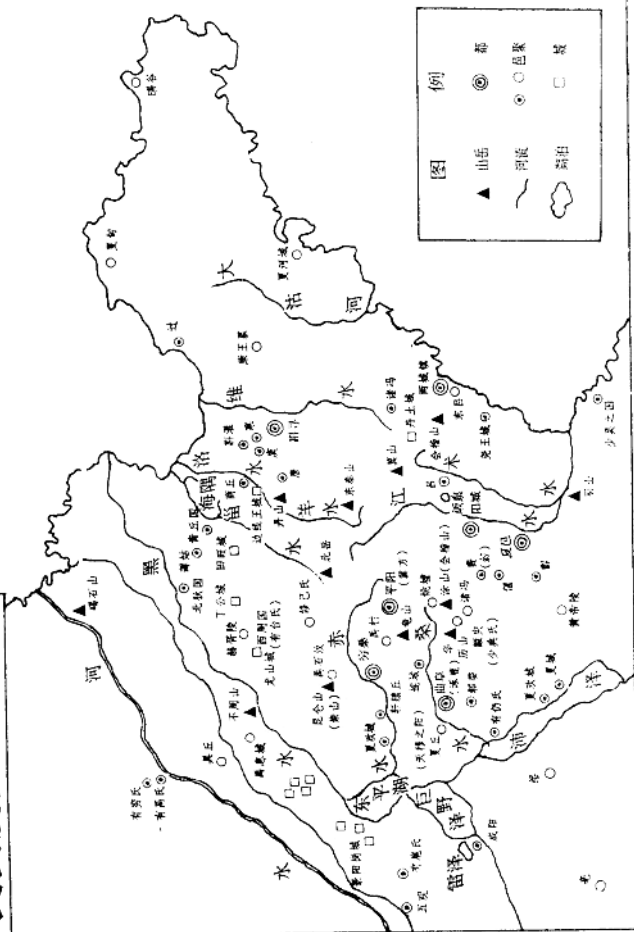
景以恩 著

# 炎黃虞夏根在海岱新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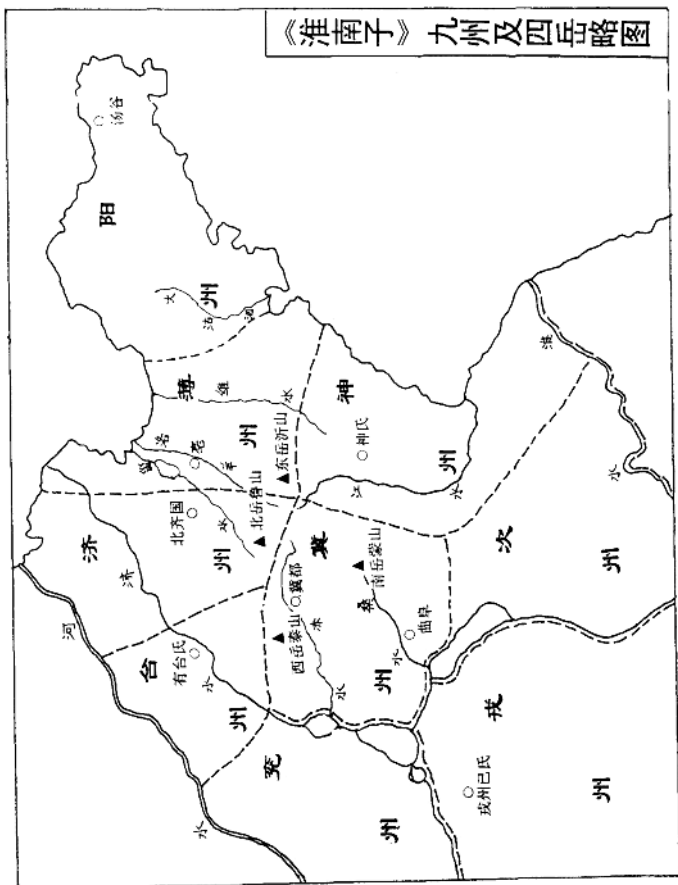


中國之歷史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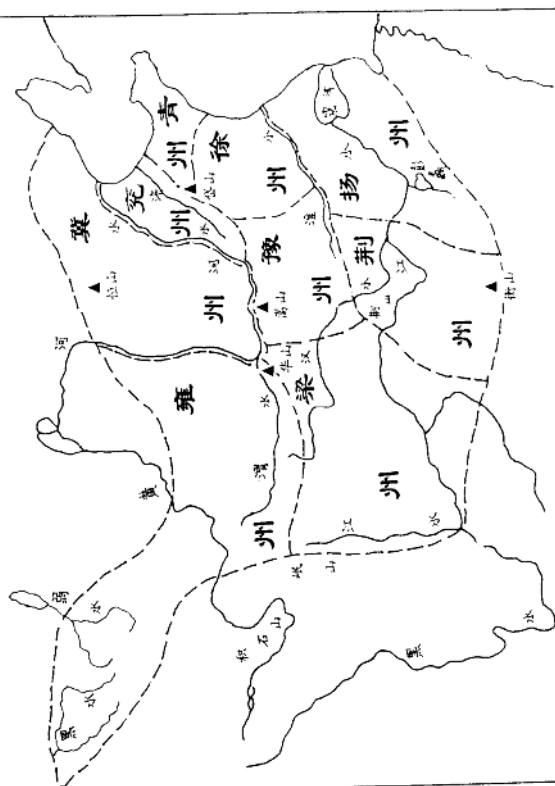
# 炎黄虞夏形势略图



《淮南子》九州及四岳略图



《禹贡》九州及五岳略图。



## 序 一

我们中国人民自古好称为黄、炎子孙，但黄帝、炎帝这些远祖的来历如何，却知之甚少。因为，还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史前期，历史传说与神话杂糅，真伪莫辨，而且资料少、难度大，是以史学界研究的人不多。建国以前，虽然已有蒙文通、徐旭生、王献唐诸先生已开其研究之端，而后继者仍寥寥无几。近有山东景以恩同志，以自学成才、业余爱好的朝气，知难而进，负起研究远古传说历史的重任，著有《炎黄虞夏根在海岱新考》一书，约二十余万言。自学成才，谈何容易，尤其学习古史，必须接触大量的古文献，遇到的第一大关，就是古代汉语。为了读通古文，必须借助于与历史学相邻的学科，如古文字学、古声韵学、训诂学等作为释读古文辞的工具。对这些工具学科，至少要有个起码的知识。但有些是属于口耳之学（如声韵学），自学是困难的。以恩同志必然克服了重重难关，才会有今日的成就。我对其全书虽未暇卒读，但仅从所阅之数篇核之，确有些独到新解。如过去有人谓炎、黄为中国东西两大氏族，现在以恩同志则举凡我国古代诸神话传说中的伏羲、神农、炎帝、黄帝以及虞、夏、商、周等族，均无不出于东方，认为华夏族自古即是一元的，原本住在东方，只是后来华夏族之一部西迁，仍居留在东土未迁的则名曰夷族。原为一族的夷夏，至是分裂为二，夷、夏之别始见。这些说法，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初读之，未必能获得首肯，但细绎全文，则其所论悉有依据，言之成理，非同于凭空臆说。可以断言，本书面世后，我国古族的传说系属，自可独树一帜。

帙矣。

以恩同志来信，略谓其书出版有日，要我写几句话。我过去对古史研究，主要精力放在商周时期，三代以前则悉依田野考古资料加以推述。至于我国的远古传说，余以资性粗钝，未敢涉及，写序一事辞之一再而不可却。我对其论文的功力是有深刻印象的，这书的成果本身也反映了他多年的奋斗精神。而我对自学成才者是尊重的。因将读后所感，拉杂书之以为序。

王哲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 序 二

研究华夏族起源，对解决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困难也很多。首先是资料问题，三代以前的上古文献资料可以说都是后人追述的神话传说，互相抵牾，真伪莫辨，难以据为信史。其次是学术界长期受有疑古思潮的影响，认为商周以前无史，视研究史前史为畏途，费力不讨好。再加上文字的障碍，故很少有人涉足于此。以致使三代以前至少一千多年的历史至今仍处于谜一般地扑朔迷离之中而真相难白。景以恩同志热爱古史，自学成才，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研究华夏起源问题长达 20 余年之久，终于完成《炎黄虞夏根在海岱新考》一书，都 20 余万言，其艰苦探索的毅力和勇气确实令人钦佩。仅从书名看，即可知他对华夏起源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例如在华夏族源组成问题上，史学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一元说或多元说的论争。本来《世本》、《大戴礼记》、《史记》等书均一致记载了三代同出于黄帝的谱系，但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华夏一元论基本上被否定了，而代之以各种多元论。以恩同志为此反复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有关原始社会血族关系的论述，结合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以证明中国华夏族同样也是一元的，即三代同出于黄帝的谱系，华夏族是一个由不同时代逐渐发展壮大的血缘亲属族团。他并且进一步指出华夏一元论与中国古代文明多元论是互有联系而又绝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前者仅指出自黄帝的华夏血族集团，后者则是指考古学上与华夏族并存的其他五大文化区系的各原始民族，二者不能混淆。

关于以炎黄虞夏为代表的华夏族起源于何方这个问题，以恩同志详细研究分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主张华夏族起源于东方，中心即在今山东海岱地区。他认为当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前期，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诸文化大系中居于领先地位，并最早出现了父系氏族社会。这与相传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及黄帝大体诞生于距今五千年左右可谓不谋而合。而同时代的中原仰韶文化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由此可见，业已以父系计世系的黄帝族不可能诞生于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中原，而只能诞生于父系氏族社会的东方海岱地区。

在此基础上，以恩同志还研究了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河南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差异较大而更接近于山东龙山文化，原因是当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大批东方人西进中原从而引起了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的变异。至于二里头文化，应是少康西迁中原后夏民族所建的较早的夏都城之一。其理由是二里头文化存在着较浓厚的东方文化因素而有别于河南龙山文化。又据碳 14 测定，二里头遗址最早的年代为公元前 1900 年左右，距夏王朝建立的前 2070 年尚晚 170 余年，其间正是夏启建都于东方、太康失国及少康复国这一段历史。因此，尽管目前有些考古学家、史学家竭尽全力，在河南寻找禹都阳城，并有人认为王城岗即禹之阳城，但王城岗东西两城加在一起也不过二万平方米，较之山东城子崖龙山城的 20 万平方米面积相差 9 倍，若说这样的小城堡即禹都，实难令人相信。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还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山东史前文化，即分为人文系统和地理系统两个互为联系互相制约的文化系统。他认为自华胥氏、伏牺氏起，经炎黄虞夏，直到少康以前，这两大系统是协调发展的，一切重大事件，包括黄帝与蚩尤之战、颛顼伐共工、尧伐有苗、禹会诸侯于涂山等，均发生在此地理系统范围内。但当华夏族大批西迁及夏王朝西迁后，不仅华夏

人文系统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原地区，而且以四岳、四渎、《淮南子》九州系统为特征的东方地理系统也一变而为包括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五岳、《禹贡》九州系统。他指出四岳与五岳、《淮南子》九州与《禹贡》九州是两个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范围的地理概念，四岳与《淮南子》九州指的是唐虞时代山东的四座山与山东九州；五岳与《禹贡》九州则是指商周时代跨有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五座山与包括数省的九州。至于四渎，他纠正了《尔雅》“发源注海”的长江、淮河、黄河与济水平行入海的四条河流的说法，而认为《汤诰》中所说大禹、皋陶所治的四渎应是“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即环绕山东境内的四条河流，这里的所谓“江”实指山东东部的沂河，与长江并无关系。这就进一步落实了《淮南子》九州与四岳在山东的问题，也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圈大体吻合。

为了落实华夏族起源于东方，以恩同志尽力搜求山东地方史志及地理图有关资料，其所绘炎黄虞夏形势图即是他辛勤研究的作品。他从中找到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古地名，如临沂的康王城与康王射箭台，对确认少康都于临沂很有价值；寿光南的赤乌城，对确认帝喾及契的出生地也有重要参考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章丘找到了后稷之母姜嫄履迹于龙盘山的传说，结合《山海经·大荒西经》关于“西周之国”的记载，他认为章丘便是先周族的最早发源地。这三个地名，均对确认夏、商、周族起源于东方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他诸如华族的始祖华胥氏及伏牺氏源于菏泽；炎黄共祖少典氏为伏牺后裔，后迁平邑之颛臾，繁育了炎黄二族；炎黄都于曲阜；少昊都于穷桑（约当今大汶口文化遗址）；帝喾都于寿光之亳；尧居于昌乐之唐都；舜生于平邑之诸冯；禹生于泰山之禹石汶村；契生于寿光之商丘；稷生于章丘之台邑；皋陶生于曲阜之偃地；伯益居费；夏启都于临沂之夏邑；太康迁于潍坊之斟寻；帝相居于寿光之斟灌；少康复国于夏邑等等，这

些地名都是作者多年探索的成果。

另外，作者还利用图腾崇拜的理论，结合山东考古发现的大量太阳纹，参考古文字学与古史传说，提出华夏族原本是崇拜太阳神并以太阳族自称的民族，即不仅“华”字古义为太阳，其余“夏”、“昊”、“皇”、“炎”、“黄”也莫不与太阳有关。所谓太昊、少昊、炎帝、黄帝等都是太阳神或太阳大帝的称谓，即使泰山上的玉皇大帝也是太阳大帝；是华夏族几千年来一直崇拜的主神。在河南大河村遗址也出土有大量的太阳纹，可能就是西迁华族的遗址。陕西的华山与华县也应是因西迁华族落户于此而得名。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华夏族确是起源于东方并为崇拜太阳的民族，而西迁中原也屡屡有实物与地名可寻。

总之，这是一部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综合考察华夏族起源于东方的力作，材料充实，观点新颖，不囿于成说，自成一家之言，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具有独特的视角与参考价值。但由于此课题过于庞大与复杂，牵涉的问题太多，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水平达到如此境界实属不易，缺点甚至错误是难免的，特别受资料的局限，作者所举的古今对照地名仍多属假设或推测之辞，有待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作进一步证实。还望有关方家对此问题展开评论。深信依靠学术界共同攻关，华夏起源问题定能获得比较理想或满意的成果。是为序。

姜作璋

二〇〇一年三月  
于山东师范大学寓所

## 前 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正如列宁所说的：历史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sup>①</sup>。这里所讲的历史当然也包括史前史。但翻阅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史记·五帝本纪》有关黄帝及其后裔的历史，便可发现它既缺乏科学性，又很少规律性。如司马迁说夏商周的祖先禹、契、稷不仅同出于黄帝，而且在同一个组织中共事，按照现代人的常识，这个组织显然是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部落联盟。这个组织既如此，上溯到黄帝时代的黄帝与蚩尤之战的情况，也只能是联盟内部或联盟之间的战争。由于受血族关系的制约，他们最初只能生活在同一片不太大的地域范围内。但司马迁所记黄帝足迹所到处地域之辽阔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如他说：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sup>②</sup>。后代学者释丸山、岱宗及釜山在山东；空桐山与鸡头山在甘肃；湘山在湖南；熊耳山在陕西；荤粥即匈奴，在蒙古；涿鹿在河北。这种横跨六省区的范围，彼此之间的直线距离也有 2500 余公里。试问，这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组织的黄帝能够作得到的吗？即使夏商周族的发源地，据司马迁说：“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

---

① 见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 358 页。

② 见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丰镐伐殷”<sup>①</sup>。后人释西羌在四川，亳与丰镐在陕西，彼此相距亦千有余里，且有蜀道之险阻，这同样是一个血族联盟所不可能作到的。总之，这种血族联盟的有限性和地域的无限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不协调性。

问题出在哪儿？是黄帝谱系有误，或是黄帝及其后裔生活地区有误？疑古学派代表顾颉刚先生认为属于前者，他说：三代同出于黄帝谱系，是战国秦汉间人所伪造<sup>②</sup>。著名史学家郭沫若也说：“五帝三王均为黄帝子孙之传说实乃后人所改造”<sup>③</sup>。就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三代一源的黄帝谱系基本上被否定了。现在普遍流行的观点是三代不同源说。

三代多源说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查遍所有的秦汉古籍如《世本》、《大戴礼记》、《山海经》、《史记》及诸子百家之书，都毫无例外或详或略地记述三代同祖于黄帝并在一起工作的事实，从不见有相反的记述。足见黄帝谱系自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绝非某些文人所能全部伪造得了的。李学勤先生最近说：“《帝系》这种三代统出一源的谱系，在近代备受学者的讥评，以为子虚杜撰，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煞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sup>④</sup>。金景芳先生则完全肯定黄帝谱系，他说：“我认为我国古书上说夏、商、周的祖先禹、契、稷，都是黄帝的子孙，同恩格斯说‘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马克思语）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不同意现行的一些历史著作那种夏是

① 见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

②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页。

④ 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羌族，商是东夷族，周是羌族的一支以及部落联盟的首领由夷和夏轮流担任等说法”<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学方面的理论对于我们解决黄帝谱系真伪之谜作了正确的解答。马克思说：美洲易洛魁人部落“联盟在表面上是建立在部落基础上，实质上是建立在共同氏族基础上。……由于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所以彼此都是兄弟姊妹”<sup>②</sup>；恩格斯也说：“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基础”<sup>③</sup>。因此，原始社会的社会基础为血缘亲属组织，是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我们的黄帝谱系完全符合这一规律，因而是科学的和有客观根据的，绝非后人所伪造。

黄帝谱系既属可靠，问题当出在对司马迁所述地名作何种理解方面。其实，司马迁对上述地名确实作过实地考察，他年“二十而南浮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sup>④</sup>；又“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sup>⑤</sup>。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他往往把华夏族后迁之地名当作原居地名。细研上述地名，多半为后迁地名，即如江淮流域据考古发现，直到商代才有华夏人的踪迹，原始社会的黄帝与尧、舜是不可能到达长江流域的。而炎黄后裔确有一个旧居地名随族而迁于新居地的习惯。现在找出哪里是黄帝血缘族团原居地，即前面讲的“一片不太大的地域范围”乃是关键所在。

①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②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0页。

④ 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 见《史记·五帝本纪》。

早在二、三十年代，即有一批国学大师探讨过这一问题，首先是东方说。如王国维说：“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sup>①</sup>；吕思勉说：“汉族缘起，必在震方”<sup>②</sup>；杨向奎说：“古河济流域实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sup>③</sup>。其次是西方说。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即主夏族起于西方<sup>④</sup>；四十年代，徐旭生也主张华夏集团起于陕西说<sup>⑤</sup>。由于这两种学说仅以文献证文献，缺乏考古资料的验证，因而仍无结果。现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八十多年丰富的考古学新成果为我们寻找华夏族原居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根据。

以考古学成果为依据，笔者认为符合以下三条者是为黄帝族发源地：（一）由于黄河是华夏族的摇篮，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和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两种文化圈中必有一种文化圈是黄帝族的诞生地；（二）距今五千年左右哪个文化圈经济最发达，哪里便是黄帝族的发源地。因为相传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亦诞生于将近五千年的时代，而且黄帝族又是有诸多创造发明的民族；（三）哪个文化圈最早实现父系氏族社会，哪里便是黄帝族的诞生地。因为据古书记载，黄帝时代已经实现了以父系计世系。

综合各种情况分析，只有东方大汶口文化圈符合上述条件。据考古学家高广仁、邵望平先生说：“当公元前三千年的前期，大汶口文化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诸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③ 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七卷六、七期合刊。

④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史料略论及其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⑤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文化大系中居于领先地位”<sup>①</sup>，并同时步入了父系氏族社会<sup>②</sup>。至于同时期的中原仰韶文化，据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不及东方，而且仍处在母系氏族社会<sup>③</sup>。结合前述王国维、吕思勉、杨向奎关于三皇五帝源于东方系统而丰富的传说，可以肯定，炎黄虞夏是发源于海岱地区的。

由上可知，以夏商周族为代表的华夏族是一个起源于东方的血缘亲属集团，它们确实是同祖于黄帝的一元化的民族。但这并不排斥与否定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即使在海岱地区，除华夏族外，尚有东夷各族。就全国而论，除海岱文化区系外，尚有五大文化区系的民族在同时创造着各自的文明，并对中国古代文明各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中国古代文明又是多元的。由于华夏族所创造的大汶口文化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在华夏族入主中原后所创造的三代文明的核心融合作用，中国古代文明似应称为多元一体文化。

进入山东龙山文化以后，华夏族在金属的发明、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阶级矛盾与贫富分化的加深、人牲人殉的发端等方面更具有典型意义。经过尧舜禹伐三苗、九黎、共工之战与大禹治水，又基本统一和统治了山东地区。从而为夏王朝建都于东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太康失国之乱后，到少康时即迁都中原。从此，华夏族的政治中心遂由东方转移到中原地区。

当中原夏王朝步入它的中后期阶段时，东方已经进入了岳石文化时代。

① 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成的贡献》，《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90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考古学辞典编写组》：《考古学辞典》，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③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综上可知，司马迁所言黄帝所到之地，除少数能落实于海岱地区外，多半是炎黄后裔由东方迁往各地之次生地名或原地名之音讹。如陕西的空桐山与昆仑山音近相通，有的学者曾指出：昆仑山即泰山之古称<sup>①</sup>。因此，空桐山原即泰山。后华夏族西迁，把空桐山或昆仑山之地名带到了西方。同时，据有的学者考证，四渎之“江”并非长江，而是今山东的沂水<sup>②</sup>；关于熊耳山据说今山东枣庄市一带也有<sup>③</sup>；而涿鹿据王献唐说与“邾婁”音近义通，邾婁在今山东邹城市及曲阜一带<sup>④</sup>。其余如司马迁所到之浙江会稽山与禹穴，据《吴越春秋》，系禹的六世孙少康封其子无余于越所致；湖南苍梧与九疑山，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考，最早的苍梧当在苏北近莒之纪城，后可能因其族类南迁，舜之地名亦随族而迁。

与上述情况相反，由于海岱文化圈是华夏族的根之所在，其人名与地名往往表现出其原生性。所谓原生性，是指除东方外不见或很少见于其它地区。例如少典氏，据《史记·秦本纪》，为东方特有氏族，其为伏羲后裔并东迁于平邑县之颍臾仅见于山东出土的《伏羲庙残碑》<sup>⑤</sup>。因此，当徐旭生谈到陕西黄帝之父族少典氏时只好无奈地说：“无法知道，未便妄说<sup>⑥</sup>”。连黄帝父族少典氏都无法知道，更遑论其它？炎帝神农氏之居于东方不仅见于《左传》曲阜有大庭氏之库，亦见于《山海经》炎帝之女女娃“溺于东海”，及在东海煮盐的宿沙氏“自攻其君而归神农”的传

① 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② 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

③ 见2000年3月14日《齐鲁晚报》。

④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6页。

⑤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87页。

⑥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1页。

说<sup>①</sup>。东海指今山东东部的黄海或渤海，证明炎帝确实发祥于东海以西地区。黄帝生于曲阜寿丘也是东方仅见地名<sup>②</sup>。同时，少昊、颛顼所都之穷桑，据杜预《左传》注，也是“在鲁北”，未闻其他地方有穷桑者，而且据说黄帝亦初都穷桑<sup>③</sup>。孟子说“舜为东夷之人”应是较早而可信的记述<sup>④</sup>；皋陶生于曲阜偃地亦仅见于《帝王世纪》等古籍<sup>⑤</sup>。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东方表现出了它鲜明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所谓系统性与完整性，首先表现在东方地理系统的完整性。东方以泰山为中心，形成环绕周边的四渎、四岳及《淮南子》九州系统，它恰与大汶口文化圈相吻合，形成了完整的东方地理系统，这是其它文化圈所见不到的。其次，表现在东方华夏人文系统的完整性，即自华胥氏起，经伏羲氏、少典氏、炎帝氏、黄帝氏、祝融氏、共工氏、三苗氏、九黎氏、少昊氏、颛顼氏、帝喾氏、陶唐氏、有虞氏，直到建夏王朝于东方的夏后氏及商、周族，在海岱地区均能找到他们的踪迹，显示出东方华夏人文系统的完整性，这又是其它文化区系所绝对找不到的。这也是笔者认定华夏族源于东方的重要根据。

以上便是笔者在后面将要详细论证的主要问题和观点。仅就目前情况而言，持此观点者仍属少数，因此，这本书应属反潮流之作，估计赞成者极少而反对者甚多，好在我已有了接受批评的

① 有关宿沙氏记载甚多：《世本》：“宿沙作煮盐”；《吕氏春秋·用民》：“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宿、夙同音；《逸周书·史记解》作“质沙”。《说文》：宿作“奴”，质古又作𡗗，与奴形近。其余，尚见于《淮南子》、《路史》等书。

② 黄帝生于寿丘说不仅见于《帝王世纪》，而且见于纬书之《河图稽命征》及《礼含文嘉》等，可见此为汉代相沿之旧说，来源颇古。

③ 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注及《史记·周本纪》正义。

④ 见《孟子·离娄下》。

⑤ 见皇甫谧：《帝王世纪》；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83页引王子襄《泗志钩沉》亦云：“泗水东南十二里有东西皋里，相传为皋陶故乡”。